

中国古代的对外汉语教学

——先秦至明清

王 幼 敏

前言

我们为什么要来研究学习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因为这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有其历史渊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建立到现在不到二百年，但是人们对语言的研究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如果没有这两千多年的积累和发展，语言学也不会突然产生。对外汉语教学形成学科虽是最近三十多年的事，但不等于此前就没有对外汉语教学。据鲁健骥先生1998年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上讲，对外汉语教学事实已经存在一、二千年了。他在会上又特别提出，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历史，是一个我们至今还知之甚少，但很重要又很诱人的题目，我们应该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发掘与研究。^①最近三十多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在“论”的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而在“史”的方面，还显得比较薄弱，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一些资料性的论著。因此，我们应该进一步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使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学科得到别人认可，而是为了弄清楚对外汉语教学在历史上是怎样发生发展的，其间有哪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哪些经验教训，有哪些可以继承的遗产，以裨益于现在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发展，对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有所帮助。现在无论中外，一谈起外语教学或外语教学法，都是西方的“故事”，好像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外语教学。西方人写的外语教学历史，从来不写东方的，当然也不会提到中国。比如加拿大人写的《语言教学2500年》、美国人写的《外语教学简史》，都是古希腊罗马写起，没有一个字涉及东方。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作者不了解东方，而我们自己对这方面的历史没有展开研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正直的外国学者曾经对此也感到很遗憾，如英国社会语言学者 R. A. Hudson 在他的《社会语言学》中文版序中就写道：“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书中）一次也没有提到中国，这一方面反

映出我本人的无知，但同时反映了中国没有出现在我所读过的著作和论文之中这一事实”。^②（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现在我们学者的研究论著，一般都把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描写为新中国以来才有的历史，^③似乎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产生，象感生神话一样偶然问世，没有学术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因此给人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感觉。尤其是我们对外汉语教学界存在着一种风气，一说起外语教学法，大都喜欢谈外国的什么法、什么主义的影响，更给人以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是舶来品的印象。上述种种表现，其实并没有正确阐述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史，至少是片面的。即使拿现在所看到的很零散的材料来说，我们的学科史也决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而要久远得多。研究发掘以至整理出一部我国自己悠久的外语教学历史（对外汉语教学史），也是填补西方人所写的世界外语教学史的空白，说得更有分量一些，可以打破某些西方人对中国、对东方在外语教学上的偏见，这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有少数学者开始探索新中国以前及古代的对外汉语教学历史。以古代时期为例，普遍都是论述隋唐及其之后的各个朝代，有些学者述及汉代。就我本人所见到的，只有赵双之先生将其溯源至先秦时期的民族语言教学。^④张亚军先生虽然也讲到周代已有会说两种语言的双语人才，也有双语学习，但他认为这还不能算作对外汉语教学，只能说是中原民族与边陲民族，是中华民族内部的言语沟通。他认为真正的对外汉语教学得从汉代外国僧人译佛经开始算起。^⑤而赵双之先生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他认为将对我国国内其他民族的语言教学（他称之为第二语言教学）与对国外民族的语言教学（他称之为外语教学）加以严格区别尤为重要。因此他的办法是把历史上的第二语言教学称为“我国外语教学的滥觞”，是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一个准备时期，从而绕开了这一敏感区域。^⑥我很赞同赵先生把对外汉语教学史溯源至先秦时期，但是对他把先秦时期对异族的语言教学区分为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存在着一定的疑问，因为这种区分主要是以教学对象为根据的。事实上在先秦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民族与国家还处在不断迁徙、融合、变化中，现在已很难准确地确定哪些民族是国内的，哪些民族是国外的，我们并不能用现在中华民族成员的标准来衡量当时民族的历史地位。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华夏族还在形成、壮大过程中，其他民族同样没有定型，有的并不服从于华夏族的夏、商、周三代的统辖，有的还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异族即是异国，应该是当时的现实状况。对这些众多民族，我国的历史记载也多以“蛮、戎、夷、狄”统称之，我们现在已很难分辨清

楚它们具体包括哪些民族或国家，所以我认为讲历史就应该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讲当时的情况，没有必要再把当时多民族之间的语言活动区分为第二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切对外族的语言教学都可称为外语教学。程裕桢先生在讲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对外汉语教学简况时也说过：“中国境内的汉民族也必定有人以各自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方式从事过外国人或外族人的汉语教学，因此，中国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应当是很久远的，只是因文献缺载，详细情况难于稽考罢了。”^⑦很显然，程先生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是把历史上汉族对外族人的汉语教学也看作对外汉语教学活动的。

一、先秦时期的民族语言教学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源头

恩格斯在阐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对宗教、哲学等思想领域进行研究时曾经富有洞见地指出：“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作为每一个时代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⑧列宁在针对科学研究方法问题向大学生演讲时也讲到了把握历史的重大作用：“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⑨研究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考察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包括研究它的史前内容和思想资料，进行历史溯源。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最早渊源，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民族语言教学，这是一种原始形态的第二语言教学，亦是一种原始形态的外语教学。

语言是交际的手段，第二语言教学的出现源于操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交际的需要。语言人类学研究表明：“语言在早期人类的狩猎和采集文化中逐渐发展，日臻完善。到了距今一万多年前，西亚首次出现定居的农业文化。这时候人类语言已经发展到了接近现代的精微程度，已知的最早文字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⑩距今五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脑皮层的语言区部位隆起，表明其已经有了初级语言；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早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出土的陶钵口沿上，刻有22种记事符号，同一文化的临潼县姜寨出土的陶器则刻有32种记事符号。与仰韶文化同期但不同系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刻有表现日出的“意符字”，唐兰先生据此论定：“我国意符文字的

起源，应在太昊与炎帝时代”。^①我国民族史的研究表明，第二语言教学这种社会现象，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是十分普遍的社会存在，只是到了文明时代才见诸文字记载。

1. 传说时代的第二语言教学

我国古代民族成分及其分布格局，至新石器末期已大体形成，因此当时的交际活动有了更鲜明的民族性质。《尚书·尧典》中有“协和万邦”之说，并有分设治东、南、西、北之官的明确记载；《舜典》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之说；《大禹谟》有“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的说法，而《禹贡》已有“禹别九州”之论，可见当时华夏与四方皆有来往。我国现在就有五十六个民族，许多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乃至文字，而在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民族更为众多，语言也更为复杂，正所谓“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②夷、蛮、戎、狄不过是对四方民族的统称或泛称，其间又包括了许多族称或族体，比如古越族就有“百越”之说，而华夏族也是由众多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古代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不但是可以想见的，而且是经史有记载、诸子有论述的。《韩诗外传》说“孔子升泰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余人，不得而数者万数也”。《史记·封禅书》记管子语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管子所记十二家，从无怀氏至汤，皆属华夏族，其他六十家属何民族就不得而知了，更何况孔子“不得而数者万数也”，如此复杂的民族之间的交际，如果没有语言上的相互传授，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据此我们已可揣测，当时天然存在着原始形态的第二语言教学，只是在原始时代的初民社会里，尚没有专门从事教育的职业教师，没有专门进行教学活动的固定场所罢了。教育发展史研究表明，当时是能为师、长者为师，教学内容多是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生产技艺，语言教学尚不独立，只能寓于生产、战争或物质交换活动之中。所以古人有“能为师者，然后能为长；能为长者，然后能为君”之说，如传说中的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有巢氏教民构木为巢，伏牺氏教民以猎，神农氏教民以稼等即是证明。

2. 有文字记载后的第二语言教学

这个时期的史料记载，对周代记载得较为详细。《礼记·王制》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

曰译。”这里所说的寄、象、狄鞮、译，就是分别指会两种语言的双语人才，而且这些名称都是这些人才的译官职位名称。周代在上古三代中国家制度最为完善，对外交往超越前代，教育事业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重大发展和变化，因此设立了专门的译官和第二语言教学师资。到周代，政教合一、以吏为师的制度更加确立，一系列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更趋完善，被纳入到国家政权机构之内。当时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祀与戎，这些活动都离不开“乐”，故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⑬文献中亦多有“乐者，象成者也”的说法，而当时的“乐”是与歌、舞联袂合璧的，故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说。^⑭《周礼·春官·宗伯》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教乐仪”，“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不学诗，无以言”^⑮的那个时代，教舞、教乐、教诗，亦即教言，先秦文献资料中关于教乐、教舞的记载，均可视之为教诗——教言、教语。在这方面有丰富的历史资料，下面举几个例子：

(1) 史传春秋时期，楚王之弟鄂君子皙要靠“越译”才能听懂越国船夫所唱的《越人歌》，而吴国公子季札北上访问诸夏，在鲁观乐，对《诗》作出评论，令孔子惊叹，他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华夏文化修养，得之于其老师楚人巫臣。历史上楚虽为荆蛮，但其上层统治集团的语言文化以华夏族的为主体，而吴、越两国则不同，其语言文化原属古越族，因而子皙听《越人歌》非经“越译”不可。巫臣原是楚国大夫，精通华夏语言与文化，由于国内政治纷争，逃亡晋国。当时晋楚争霸，巫臣献联吴反楚之计，受派作为晋国使者出使吴国，带去了中原文化和语言，继而定居吴国，任吴国“行人”，在教化吴国、向吴国传播华夏文化和语言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培养出了季札这样高水平的学生更是了不起的成就。所谓“越译”、“行人”，都是懂双语的人，也都是从事翻译和第二语言教学的人。

(2) 《周礼·秋官·司寇》中记载：“蛮隶掌役校人养马”，“闽隶掌役畜养鸟，而阜蕃教扰之”，“夷隶掌役牧人养牛马，与鸟言”，“貉隶掌役服不氏而养兽，而教扰之，掌与兽言”；《周礼·春官·宗伯》中记载：“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鞮鞻氏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其中蛮隶、闽隶、夷隶、貉隶等，分别为周朝征南、东、东北夷所俘获之。他们教鸟语、兽言，并非真有什么鸟语、兽言，实际是原以鸟、兽为图腾的民族的语言，可见他们也是懂双语的人。至于旄人、鞮鞻氏掌教“四夷之乐与其声歌”，《周礼正义》注疏肯定“四夷之乐亦皆有声歌”，特意强调“声歌”，可见教“四夷之乐”亦即教“四夷

之言”，他们也便是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

从史料看，我国最早设置翻译这个职能机构，并对译官使用“象”、“译”等称谓，大概自周初开始。《尚书大传》说：“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悠，山川阻深，恐使不通，故重译而朝。’”越裳氏是古越族的一部分，其国大概在今越南北部。此处“象”、“译”就是翻译，“三象重译”就是经多人多次翻译。颜师古注《后汉书·平帝纪》中“重译”云：“越裳南方远国也。译谓传言也。道路远绝，风俗殊隔，故累译而后通也。”前述《礼记·王制》中还讲到“寄”、“狄鞮”等其他的译官名称，各司一方之言，有人认为是对方言的翻译，这是不对的。历史上渤海、黄海沿岸，包括朝鲜半岛在内，古称“东夷”，商朝灭亡，箕子“走之朝鲜”，在那里“教民以礼义田蚕”，成为我国第一位华侨；我国与日本的交往可追溯到史前时期，先秦时期南北两支东渡人去日本，战国时期日本与燕国有来往，故《山海经·海内北经》说“倭属燕”，秦朝有徐福东渡扶桑，河北省盐山县成为我国第一个侨乡。我国与中亚、南亚、东南亚的交往，许多也在先秦就开始了。比如越南，日本历史学界一向认为最初的越南历史文化是属于“中国文化圈”的，古文献上“南方曰蛮”是包括“不火食”的交趾的，越裳国就是交趾的一部分，尧时“宅南交”，舜时“南巡狩”，大概也与越南有关。缅甸有龙公主与太阳神相爱生下三个龙蛋的神话，其中一个龙蛋破裂后为美女被神送往中国，成为中国皇后，所以中缅称“胞波”，即一母所生的同胞。历史学家已证明，现在定居在缅甸境内的各民族，大多是史前时期开始从我国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迁入的。缅甸还是我国通往印欧的要道，所以汉代在中缅边界设永昌郡，以发展中印欧之间的联系。《后汉书·和帝纪》曰：“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掸国即由缅甸掸族（我国境内称傣族）建立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掸国，还有“外夷”或“外蛮夷”“重译奉贡”，他们是否来自欧洲？我国史载古罗马（大秦）的“幻人”就是经由缅甸来到中国的。另外，史传周穆王西巡，表明其时华夏文化与骑马文化、草原文化已有接触。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逐北狄、山戎于塞外，则民族语言教学作为外语教学向欧洲扩展不是没有可能的。从先秦文献史料上看，寄、象、狄鞮、译等都为译官和外语教学师资，只是分工不同，各司一方之语言。孔颖达疏《礼记·王制》有云：“达其志，通其欲者，谓帝王立此传语之人，晓达五方之志，通传五方之欲，使相领解。其通传东方之语官谓之曰寄，言传寄外内言语；通传南方语官谓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内

之言；其通传西方语言谓之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之语与中国相知；其通传北方语言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官职曰“象胥”。《周礼注疏》曰：“象胥掌蛮夷闽貉戎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谕说焉。”郑玄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类之本名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合总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胥者，长也，象胥也就是译官的总官长。由此可见，至少到了周代，我国的外语教学不但有分工，而且领导机构完整。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当时的外语教学与母语教学已具有较为明确的划分，标志着我国的外语教学已具有相对独立性。《周礼·春官·宗伯》有如下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这段文字除了进一步说明“以吏为师”、“寓教于乐”外，更重要的是将“言”和“语”划分为两个并列的学科。关于二者的区别，郑玄注云：“言，言己事，为人说曰语。”郑注反映了先秦史料对此二词使用的实际，如《论语》之名，就是传孔子及其弟子之言；《国语》就是传春秋时期一些人物的言论。“语”的这种用法一直延续到两汉魏晋南北朝。汉代荀爽《汉语》“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大概如《国语》记他人之评论；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更是“以其语语之”了。而所谓“诗言志”、“文以足言”等，都是“言己事”的。前面所讲译官职责就是达来使之意、传王者之言，即“为人说”，故《礼记正义》孔疏称寄、象等译官为“传语之人”。用现代术语来说，教“言”即教母语，目的在于更好地运用语言“言己事”；教“语”则是把民族语言作为外语教学，目的在于掌握“为人说”的技能，让不同国家的人“使相领解”，促进交流。所以“言”和“语”的这个区别和划分，不但说明当时将民族语言作为外语教学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而且说明它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独立于母语教学，标志着我国原始形态的外语教学正式诞生，形成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源头。

3. 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雅言”教学

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有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⑥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便被串在一起，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其实，讲到中国历史，孔子就不是把中国史看成铁板一块。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⑦就是把夏商周看成是三家不同源的文化来

进行比较得出的结果，而不是一连串的三代。汤武革命不是继承，三家的文化各有千秋，可以互补，但还是周人的文明全面。“周礼”是国家大法，是周人建国治国的系统理论，以一个“文”字代表典章的制度化，是国家已成熟的表现，殷人还未达到这水平，所以孔子要以周为主。古人云，“入夷则夷，入夏则夏”，是看到中原的夏和四周的夷各有各的根。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所以华夷之间的差别并不是绝对的。孔子“有教无类”的名言，也是认识到他的弟子们来自四面八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背景来源不一样，甚至差别很大，而且有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别。“有教无类”的“类”，一般都解释为身份、背景，较少联系到种族问题，但殷墟出土的大批人头骨，专家分析后指出活动在商代中心地区的人们种族差别很大。李济先生在《再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文中说：“从著名安阳遗址出土的人骨资料来看，就远不是纯一人种的。从研究这一人骨的头形指数计算出的标准偏差数，远远超出正常范围，这肯定地说明这一组颅骨有着极不同的来源。”虽然时代越近人种差别越小，但在孔子时代，中原地区的人种差别仍然很大，所以“有教无类”主要不是指社会贫富等级差别，而是指种族特征差别，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平等待人，反对种族歧视。^⑧由于面对的是多文化且复杂的民族传统社会，所以他讲课的内容也是包罗万象，兼容并举的。《周礼》所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覆盖了多种文化需求。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学生，孔子是用什么语言来教他们的呢？我们不妨以《论语》里的两个事例来推测一下。当时东周的首都在洛阳，洛阳话是当时的共同语，称为“雅言”。孔子曾去洛阳问礼于老子，而老子是楚国人，孔子是鲁国人，言语各异，当然只有用雅言才能交谈。孔子一生都重视《诗》，也就是今天的《诗经》，他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习《诗经》都不能开口说话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诗经》里的语言是在重大典礼或正式场合才使用的，人们在那种场合如果要发言说话，按惯例都要首先引用《诗经》里的诗句作引子，否则就被视为“非礼”，而在议论驳难时更得引用《诗经》才显得高雅有力。《论语》里有多处提到孔子与学生谈论《诗》，可见《诗》是孔子教学的一门重要课程。《论语》里有一段话证明孔子是用雅言来教《诗》的：“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⑨意思是说孔子在诵读《诗》、《书》和赞礼时都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那么孔子会说“雅言”，而且用“雅言”授课是毫无疑问的了。

历史本身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把社会发展史当成唯一的、全部的历史，就把中国历史简单化了。其实，把社会发展史视为全部历史，在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并不能找到什么理论根据。恩格斯就不认为人类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和国家产生的道路全世界只有一条，他写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里，就提出国家的产生至少有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它们各有特点，通过不同的途径，完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制约的由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和国家的产生。因此，我们不能用今天中华民族大一统的观念来套古代社会的民族和国家。

二、两汉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传播与“胡僧”学习汉语

中世纪的欧洲人曾流行学习拉丁语，其目的是为了阅读用拉丁文写的古典文献资料，所以是从学习书面语开始，而汉语作为外语学习，是从口语开始的，其原因是为了传播佛教。

佛教开始传播于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亚西亚一带，所以那时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是佛教，现在巴基斯坦和中亚西亚一带大都信伊斯兰教了。西汉末东汉初，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早期僧人大都来自安息（今伊朗）、大月氏（今阿富汗北部和塔吉克斯坦）、康居（今哈萨克南部）、罽宾（今克什米尔）、天竺（今印度）等地。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东汉桓帝建和初年到南朝宋文帝元嘉末年，大约三百年间，来中国的西方僧侣有63人，其中东汉时8人，三国时8人，西晋时5人，东晋时8人，南朝刘宋时10人，前秦苻坚时8人，后秦姚兴时8人，年代不详者8人。^②这些“胡僧”来到中国，为了传播佛教必须学习汉语，而且首先要学习汉语口语，以便接触中国人，这一点与欧洲传教士为了传教而学习外语的情形大致相同。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曾经就此谈到：“传教士，他不得不学习某种完全陌生的语言，这种语言没有现成的课本或词典可用，学习它不仅是为了处理日常事务，而且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教和翻译圣经。”^②当时胡僧们学习的汉语是以洛阳话为基础的雅言，他们为了学习汉语发音，采用了用梵文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方法，于是把拼音方法传入了中国，汉代的儒生由此得到了启发，发明出反切法，改变了以前用同音字注音的直音法。《隋书·经籍志》中记载：“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这便是关于反切法受梵文影响的明确记载。

胡僧们学会了说中国话，向人们讲解、宣传佛教的教义，但仅仅口头宣传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佛经翻译成汉文，这样才能扩大宣传，于是又出现了学习汉语书面语的问题。在汉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已然言、文分家，对

于这些仅会讲一些汉语的胡僧来说，要把佛经翻译成地道的汉文，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出现了外国僧人与中国一些知识分子或佛教徒合作翻译的现象，也就是先由胡僧口授，再由汉人笔录下来，最后整理成书。梁释僧祐在《出三藏记集》里就记载了安息国僧人安玄与汉人严佛调合作译经的情况：“骑都尉安玄，临淮严佛调，斯二贤者，年在韶龄，弘志圣业，……都尉口陈，严调笔受。言既稽古，义又微妙。”有时一部佛经的翻译，靠两个人还不能完成，需要几个人通力合作，辗转几种语言，最后才译成汉文。所以，最早的佛经比较通俗易懂，接近当时口语，因而也是我们研究汉魏六朝时汉语的宝贵材料。

佛经既然是两种语言的翻译，必然遇到汉外语言对比的问题。僧人们通过翻译的实践，看到了梵文和汉文两种语言的差异，所以提出了在语言上的翻译原则，即“五失本”和“三不易”的视点，这种视点是晋代僧人道安提出来的。所谓“五失本”，是指在把梵文翻译成汉文时出现的五种梵汉文的差异：“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言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梵文和汉文语序不一样，梵文是倒装，翻译时应按汉语习惯翻译过来）；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梵文比较朴实，汉文讲究华丽，翻译时要作一些修饰）；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梵文一个意思要反复说，汉文要求简洁，翻译时要进行删削）；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检向语，文无以异，或一千或五百，今并刈而不存，四失本也（梵文正文后面还有总结全篇要旨之辞，翻译时也要把它删掉）；五者，事已合成，将更旁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梵文一件事说完了，要说另一件事时，还要把前边的事再说一遍，译成汉文时也要删掉）。”所谓“三不易”，是指翻译佛经时有三点难以做到：第一，圣人是依当时的习俗来谈话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应今时，很不容易；第二，把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识者，很不容易；第三，释迦牟尼死后，弟子阿难造经时尚且非常慎重，现在却要由平凡人来传译，很不容易。道安的理论虽然是从翻译的角度提出来的，但也涉及到了一些语言上的对比研究，这在我国翻译史上和汉外语言对比研究的回顾中，都是值得一提的。

东汉初年来华的古印度僧人摄摩腾首译《四十二章经》，古波斯人安世高“以汉桓帝之初，始到中夏”，“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语”（见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并译出《大安般守意经》、《道地经》等三十四部，说明他们已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可见那时就已经存在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或教学的

事实，只不过那时的汉语学习和教学不是一种学校教育范围内的教学活动。

三、隋唐时期的对外交往与周边国家派遣留学生

1. 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团中的留学生、学问僧

中日关系，源远流长。早在《论衡》、《汉书》、《后汉书》等书籍中就有关于日本的记载，日本《纪伊风土记》也记载了孝昭天皇时，中国船遇难漂到日本熊野浦的事。日本《古事记》说，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284年，晋武帝太康五年），阿直歧自百济（朝鲜半岛三国之一）东渡日本，日本皇子稚郎子跟他学习汉文。第二年，百济华裔王仁带去《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稚郎子跟王仁学习汉语，这便是日本人学习汉语的开始。到隋朝时，日本圣德太子两次派遣小野妹子为遣隋使来中国，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和学问僧直接来隋学习中国文化。自开皇二十年（600年）至大业十年（614年），日本先后四次派使臣来中国，带来僧徒数十人。608年，日本派留学生、学问僧8人来中国，其中有名的有高向玄理、舒明、南渊请安等人。唐朝初年，高向玄理、南渊请安和学问僧僧旻先后回国。645年，日本孝德天皇任用高向玄理做国博士，仿照唐朝制度，进行社会改革，这次改革即“大化改新”。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回国后大力介绍中国文化，对于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日本的养老令源出唐令，日本的平城京（今奈良）和平安京（今京都）也都是仿照长安城设计修建的。

到了唐朝，中国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日本则处于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变革时代。进一步扩大中日交往，两国都有新的需要和可能，中日交往于是出现高潮。日本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派出“遣唐使”十三次，还有六次迎送唐朝的使者，合计十九次。初期遣唐使团规模还不小，每次一、二百人，一、两只船。公元八世纪以后，使团规模逐渐扩大，每次一般五、六百人，分乘四只船。使团的组织也更加完备，有大使、副使等官员，有留学生、学问僧，有医生、警卫、翻译人员，还有大批船匠、水手。随“遣唐使”团到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先后共有132人，他们十几年、几十年长期生活在中国，对唐朝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在这些留学生中，比较著名的有阿倍仲麻吕（晁衡）、吉备真备等人。关于这二人，在日本《大日本史》卷116《阿倍仲麻吕传》和卷123《真备传》中都有记载。随日本遣唐使来华的还有许多学问僧，著名的有道昭、圆仁、最澄、空海等

人。他们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佛学，空海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1) 阿倍仲麻吕 (698-770年)

我国《旧唐书·日本传》中有记载：“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晁衡。”仲满就是阿倍仲麻吕，不过他不是偏使，而是留学生。阿倍仲麻吕717年19岁时来到长安，在国子监读书，老师为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业完成以后，留在唐朝任职，没有回国，后来担任了唐朝的秘书监（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晁衡同李白、王维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753年，已在中国生活了35年的晁衡，请求随日本遣唐使回国，得到唐朝批准，同时被任命为代表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臣。行前，王维写了《送秘书晁衡监还日本国》一诗。后来，晁衡的船在海上遇险，消息传到长安，他的中国朋友们都以为他死了，十分悲痛。李白写了一首《哭晁衡》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悲色满苍梧。”其实晁衡并没有死，他随破船漂流到越南，又辗转返长安，一直住到逝世。他先后在中国生活了54年。

(2) 吉备真备 (695-775年)

唐开元五年（717年）与阿倍仲麻吕一起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华，在唐学习17年，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携大量中国典籍东归，任大学寮助教，为各科生徒讲授学自中国的新鲜知识，把中国的科学文化介绍到日本，并取中文楷书体汉字偏旁创制了日本片假名，为日本文化、文字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片假名所依据的汉字共有50个，称作“母字”，如“伊、吕、波”等，“相传为吉备真备从遣唐使留学，其师王化言所定。”²⁸王化言可说是唐代又一位杰出的对外汉语教师，为日本民族文字的创制贡献了聪明才智，提供了切实帮助。真备在政治上也很有作为，历任重要官职。唐天宝十一年（752年）任遣唐副使再次赴唐，受唐玄宗接见。次年在扬州拜会鉴真和尚，一同赴日。

(3) 空海 (774-835年)

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随遣唐使入唐学法，留唐两年多。回国时带回大批真言宗（密宗）的经典，在日本创建了真言宗。他编写的《文镜秘府论》和《隶万象名义》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字学的重要著作，其中《文镜秘府论》也是一本教写诗作文的书。钱钟书先生认为这本书“粗足供塾师

之启蒙蒙”，郭沫若先生则认为这本书反映了当时教外国人写作的方法，^②也就是说，空海在长安留学时他的中国师傅就是这么教他的。空海最出名的成就就是取草书体汉字创制了日本平假名，同吉备真备一样，为日本的文化、文字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 朝鲜（高丽、百济、新罗）留学生

唐朝时，还有相当多的朝鲜学生在长安留学。唐初，朝鲜半岛分为三国：高丽（在半岛北部）、百济（在半岛西南部）、新罗（在半岛东南部）。唐太宗提倡儒学，重视科举，高丽、百济、新罗三国相继选派贵族子弟到长安读书。《新唐书》记载：“（贞观）十三年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到7世纪70年代新罗王金法敏统一朝鲜半岛以后，中朝两国各方面交往进一步发展，双方使节往来更为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从650年至841年约一百九十年间，仅新罗就向唐朝派遣使者达二十一次。大批新罗商人乘船横渡黄海，到唐朝来经商。唐朝曾在楚州等地设置“新罗馆”，专门接待新罗客人。在扬州、涟水、诸城、牟平、文登等许多城市，也住有不少新罗人，他们聚居的街巷，叫“新罗坊”。在唐朝外贸输入总额中，新罗物产之多，居各国首位。唐朝后期，到长安读书的新罗留学生更多了。《新唐书》记载：“新罗，异韩苗裔也。居汉乐浪地，……玄宗开元中，数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学学经术。”有不少朝鲜留学生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当时称为“宾贡进士”（来自邻邦的进士），有的还担任了唐朝的官职。从9世纪到10世纪中叶的约一百五十年间，朝鲜人在中国考试及第的有九十多人。其中最有一个人名叫崔致远，就是宾贡进士，我们读唐诗选本时常会读到他的诗，还以为他是中国人呢。崔致远12岁来中国，18岁中进士，曾在淮南节度使（驻扬州）衙署中任职，后来回到了新罗。他写的文章诗歌同中国人的作品毫无二致，其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集》保存了不少有关当时中国的珍贵史料。新罗国王曾对中国商人马行余说：“每年都有新罗的学生从长安学成归国，我都加以重用。”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由长安回国一批新罗留学生，竟多达105人。留学生把唐朝的先进文化传入朝鲜，对朝鲜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时的新罗都城平壤，就是仿照长安的布局营建的。

3. 其他国家各种人士在唐朝学习汉语的情况

(1) 天竺僧人

唐朝时，除日本僧人外，天竺各地僧人也云集长安，他们学习汉语，参加唐朝翻译佛经的工作，见于记载的先后有二十多人。另外，天竺的天文学家还在长安司天台中担任职务，参加历书的制定工作，并翻译了印度《九执历》。

(2) 西域商人

除留学生、僧人外，学习汉语的人群还有各国商人。唐朝的对外交往范围很广，当时中国和尼泊尔（今尼泊尔）、天竺（今印度）、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诃陵（今印尼爪哇）、骠国（今缅甸卑谬一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中亚的康国、石国、安国等昭武诸国，西亚的波斯，欧洲的拂林（东罗马帝国）建立了联系，互通使节。除了新罗商人外，西亚的波斯商人也大批来到唐朝，在长安、扬州、广州等地，都有“波斯店”。还有大食，是当时西亚、北非的大国，唐高宗时遣使通好，此后一百多年里，大食使者到唐朝有三十多次，有的大食人在唐朝长期居住。许多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的商人也在中国定居下来。

(3) 越南人

汉语对越南的影响也很大。《三国志·吴志·薛综传》：“昔日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三国时士燮，任交趾太守，封龙编（今越南河内）侯，统治交趾四十余年，时交趾以“土王”称之。明人严从简说他“乃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说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²⁴ 据此可知，士燮教交趾人学习中国经书的方法是将原文翻译为越南语，可视为历史上最早用翻译法进行第二语言教学的先驱。

汉字在秦汉时便传入了越南，到唐朝时，汉语影响更加扩大。初唐著名诗人王勃之父王福畴，唐高宗时任交趾县令，在当地“大开文教，士民德之”，为立祠堂，予以祭祀，至清朝仍香火不断，越南人称之为“王夫子祠”，²⁵ 足见其对当地文化教育的历史功绩和影响。越南历史上一直使用汉字，直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侵入越南为止。

4. 唐朝佛教界的对外汉语教学

唐朝佛教界的众多高僧因收有“洋弟子”而与对外汉语教学结下了一定“缘分”，并成为唐朝对外汉语教学的一支重要力量。玄奘、义净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永徽四年（653年）来唐的日本学问僧道昭（一作“道照”）曾师事玄奘，“三藏特爱，令住同房”。鉴于道昭的自身条件和禅宗尚未传至日本的实际情况，玄奘建议道昭学禅，谓曰：“经论深妙，不能究竟。不如学禅，流传东土。”师徒结下了深厚情谊，道昭回国时，“三藏以所持舍利、经论咸授和尚”，并将伴随自己多年、用于煎药养病的铛子慨赠道昭。道昭归国后创建禅院，弘扬禅宗，在日本佛教史上留下了美名。除道昭外，贞观元年（627年）15岁来唐、84岁卒于洛阳的新罗僧人圆测，也同玄奘有师生之谊，曾向玄奘学习《唯实论》。

义净，字文明，俗姓张，范阳人，幼年出家。唐咸亨二年（671年）乘海船赴天竺留学10年，此后游历诸国，足迹遍及三十多个国家。证圣元年（695年）返回大唐，潜心译经，参与其事的外国僧侣有吐火罗沙门达磨末磨、中天竺沙门拔弩、罽宾沙门达磨难陀、东天竺居士伊舍罗、瞿昙金刚等。这些人无疑都懂汉语而参与译经，在其汉语实践过程中得义净指教，对其汉语水平的提高当大有好处。义净撰写了或许是我国最早的梵汉双语词典《梵汉千字文》，该书收录常用梵字995个，每个梵字均有汉字对音，下边并注有汉字，把这些汉字连起来便成为四个字的一句话，故称“千字文”。该书不仅为中国人学梵文提供了得力工具，也对懂梵文的外国僧侣学汉语裨益良多，是义净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5. 唐朝政府的留学生政策

(1) 学习机构

刘询《旧唐书·日本传》记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那时候语言教学和儒学教学是密不可分的。所谓四门，原是指古代封建帝王在京都四郊设置的四学。后魏时，因四郊太远，改设在国子监的四门，所以叫作四门。学校里的正教官称四门博士（七品以上），助教官称四门助教（八品以上）。赵玄默应该说是我国历史上教外国人比较早的教师了。由此可见，唐朝时来华的外国留学生都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汉语的。

(2) 留学生待遇

王溥的《唐会要》中记载：“开成元年（836年）六月，敕新罗宿卫生王子金义宗等，所请留住学生员，仰准旧例留二人，衣粮准例支給。二年（837年）三月，新罗差入朝宿卫王子，并准旧例，割留习业学生，并及先住学生等共二百十六人，请时服粮料，又请旧住学习业者，放还本国。敕新罗学生内，许七人，准去去年八月敕处分余时十马畜粮料等。既非旧例，并勒还蕃。”由此可见，唐朝当时向这些外国留学生提供衣粮和马畜食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享受“中国政府奖学金”待遇。

(3) 长期居留政策

唐朝政府对于外国人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外国人（包括留学生）长期居留，来去自由。上述日本留学生晁衡在华居留54年，终老于中国，中间曾允许他回日本，只是因为自然因素没有成功。其他留学生也有很多在中国居留，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如新罗人崔致远。更有象上述一些外国商人在中国各地居留经商，甚至定居下来娶妻生子。综上所述，唐朝时候的长安，的确是一座向各国开放的国际性大都市。

四、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对外汉语教学

1. 中国的内政外交对汉语传播的影响

宋朝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与异族的对峙战争，这不能不影响到它的施政方针。终其一朝，都不是开放的，而是内敛防守。到了元朝，蒙古贵族对内实施民族压迫，对外穷兵黩武，元世祖曾多次发兵侵入周边邻国，两次出兵日本，两次出兵安南（越南），两次出兵缅甸，又出兵占城（越南），爪哇（今印尼境内），使中国和邻国的关系，特别是和日本的关系蒙上阴影。加之那个时期是日本的镰仓、室町时代，适逢内乱，汉学在日本也不那么兴盛，日本来华留学的学生就少得多了。元朝统治者忽视文治，恐怕是对外汉语教学最不景气的时代。《国子监志》云：“案元之启疆，最为辽阔，远泽之臣服者，纷纷于史册，而遣子入学，独未之有。”整个宋元时期，对外汉语教学远不如唐朝时那样昌盛。明王朝也不象唐王朝那样开放，对外国有种种限制。比如，对朝鲜人的限制就很大，不准商人自由往来。清朝更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都影响了与外国的交流。

2. 这一时期来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情况

(1) 日本人

虽然不再有大批的留学生来华,但是宋明理学还是通过僧人传到了日本。日本临济宗开山祖师荣西曾两次来中国,带回去大量理学书籍。还有俊芿和尚在中国留学十多年,回国时除了带回大量佛经外,还带回了很多儒家经典。《明史·选举志》记载:“日本、琉球、暹罗诸国皆有官生入监读书,辄加厚赐,并给其从人。永、宣间,先后络绎。至成化、正德时,琉球生犹有至者。”

(2) 朝鲜人

《国子监志》卷18记载:“明自洪武初,即有高丽、琉球、中山王山南,遣子入学。其后来者络绎。”黄佐在《南雍志》中写道:“外裔子弟,始自高丽遣金涛等四人入国学读书。洪武四年,涛登进士,除授县丞,不就,与三人皆遣归国。洪武五年,高丽国王王颙,遣使贡方物,且请遣子弟入太学,……后竟不至。日本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尝遣官生入监,后亦不至。唯琉球国则常至焉。考之故牒,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送官生日夜每等入监,帝命工部每人给与罗绢衣服,俾为秋衣,仍与现成铺盖,从人给与棉布衣服”。这里较为详细记载了外国学生入国子监学习的情况,明朝皇帝还亲自过问此事,给学生们提供罗绢衣服,而且他们想回国,也听其自便。除了国子监的官学以外,据史料记载,明朝辽东地区还有一些地方官、谪居辽东的朝廷官员,以及弃官闲居辽东的士人,因常在当地教授前来学习汉语的朝鲜人而名垂朝鲜史册。在此期间,出现了两本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老乞大》和《朴通事》。这两本书是明朝初年编写的,作者已不可考,但有证据表明是中国人编写的。书中的语言是当时北京的口语,和元曲说白中的语言一致。

(3) 俄罗斯人

清朝政府对邻国俄罗斯人学习汉语的政策有别于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国子监也对俄罗斯人开放。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沙俄向清政府提出派人来华学习汉语。清康熙二十八年(1690年)开始在国子监设俄罗斯学馆,接受四名俄国留学生学习中文。《国子监志》卷18中记载:“外藩就学国子监者,有琉球学,有俄罗斯学,俱不常设。其所遣陪臣子弟入学读书,由监臣遴贡生为教习,又派博士助教等官薰之,学成遣归。”

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俄罗斯向中国派遣留

学生开始定期化，规定与东正教传教士团一起，每十年更替一次。是年，俄罗斯派出陪臣子弟五人诣京，清政府派满族助教胡什图汉、汉族助教陈宪助二人专门负责他们的教学事务。此后直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俄罗斯学馆一直有学汉语的俄罗斯留学生，清政府每月向他们发放钱米及日常生活物品，在他们学成归国时还发给路费。这些留学生中有不少人成了俄国汉学家，其中著名的有俄国第一批满、汉文教授丹尼尔·西维洛夫、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等。

(4) 西方人

这里所说的“西方人”是指除去俄罗斯人以外的欧美人。欧美人学习汉语起自传教士东来的传教活动，先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后是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时当我国明朝中后期，遭遇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挤压的旧教天主教决意东向发展，派出耶稣会士前来中国传教，经由被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进入内地。耶稣会的东方巡视员范礼安要求进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必须首先在澳门学会汉语，做好准备。最早派来的是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他们于1581年到达澳门。因为前此葡人的不端行为，明朝对西方人持不欢迎态度，跟对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邻国不一样，西方人连踏进大陆都有困难，更别说入国子监学习汉语了。

罗明坚和利玛窦只好一边自学，一边花重金聘请家庭教师授课。这样的学习方式成为以后近三百年传教士以及其他西方人学汉语的基本方式，都是分散零星的教学。虽然没有有组织的对外汉语教学，但是这种个别授课加自学的效果却出奇的好，甚至超出了前述官方的留学生教育。罗明坚和利玛窦在澳门只学了一年，就初步掌握了汉语，能够进行交际了。据统计，在以后的近三百年间，来华耶稣会士留下的中文著作就有七百部至九百部之多。可惜的是那些耶稣会士的汉语老师没有留下来姓名，他们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值得一提的是，罗明坚初步学会汉语后，曾在澳门办起了一所“圣玛尔定经言学校”，既在那里用汉语向中国人传教，同时又兼作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学校，这是明末中国第一所外国人学习汉语的专门学校。后来到1594年，耶稣会在澳门建立了圣保禄学院，是一所规模较大的神学院，汉语是该校必修科目，澳门遂成为天主教向中国和远东派出传教士的培训基地。罗明坚和利玛窦由此成为明末最早学习汉语的西方人，并进而成为西方最早的汉学家。

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年进入中国大陆，经过几年活动后，利玛窦于

1601年进入北京朝见万历帝，受到礼遇，得到允准在北京居住、传教，得以与上层官僚士大夫自由交往，从而站稳了脚跟。罗明坚和利玛窦不但重启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开启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一波高潮。

在18-19世纪，英国和美国先后发生宗教复兴运动，以迎接千年王国的来临。新教徒们“兴奋”、“觉醒”，加倍宣扬基督教精神，从而兴起传教运动，各宗派纷纷成立差会，派遣传教士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亚非地区传教。新教于19世纪初传入中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是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他于1807年到达广州。然而新教没有旧教那么幸运，由于罗马教廷在“礼仪之争”中顽固坚持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的立场，而且出言不逊，终于激怒了康熙帝。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康熙帝发出禁教令，以后的雍正、乾隆、嘉庆诸帝均采取禁教政策，基督教由此失去了在中国的合法地位，成为清政府取缔和打击的对象。乾隆帝又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下令实行一口通商的闭关政策，西方人只准在广州一地贸易，不准进入其他地方，西方人失去了在中国行动的自由。当时清政府不但禁教，还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汉语，严禁外国人购买中文书籍，这便是新教传教士来华活动时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形势。因此，马礼逊来华后，在广州东印度公司商馆里隐藏了一年，后来以公司译员身份露面，不敢暴露其传教士身份。马礼逊极有语言天赋，到广州两年后即能用粤语和官话与人交流，当然他的汉语学习是偷偷进行的。据马礼逊说，他聘请的一位中文教师，来上课时总是怀揣毒药，随时准备一旦被官府发现就服毒自尽，以免受牢狱之苦。^{②6}为了隐秘，马礼逊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里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和中文老师。^{②7}而据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说，他聘请的中文教师来去时总是拿着一只女鞋，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装扮成一个修鞋匠。^{②8}

马礼逊在华25年，处于这样的环境下，终其一生还能取得三大成就：以汉语全译了《圣经》，编撰了六卷本《华英字典》，撰写了数部汉语学习的语法书和教材。另外，还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学院，这是那个时期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新教传教士最重要的汉语学习基地，从那里走出好些著名的西方汉学家。自马礼逊入华后，1829年美国公理会也派裨治文来华，由此拉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美国对华传教活动的序幕。随着大批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掀起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第二波高潮。同耶稣会士的汉语学习相比，这波高潮无论在广度、深度、影响等几个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者。除马礼逊之外，新教传教士中陆续涌现出一批研习汉语的专家，英国方面有理雅各、麦都思、艾约瑟、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美国方面有裨治

文、卫三畏等，他们在当时也是享有盛名的汉学家，在对外汉语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著述远远超过了耶稣会士。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清政府锁国的大门轰然洞开，禁教政策失效，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在鸦片战争中，一批精通汉语的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大显身手，展现了汉语的巨大用途，比如当时活跃在与清政府谈判桌前的汉语翻译“三剑客”：郭实腊、马儒翰、罗伯聃，又是一番别样的人生，这是后话。时针被枪刺拨进了近代，中国的古代结束了。

注释

- ① 见鲁健骥先生提交的会议论文《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于1998年7月在大连举行，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在20世纪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会议共收到120余篇论文，1999年由华语教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 ② 转引自鲁健骥《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谈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30页，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
- ③ 参见吕必松《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我国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项专门的事业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1950年开始的。”（1989）李培元《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40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时候，……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已走过了将近40年的路程”，“成批接受外国留学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1950年开始的。”（1989）张亚军《对外汉语教学法之研讨》：“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政府重视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从1950年算起，已有三十六年历史了”。（1987）张亚军先生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上的对外汉语教学》，注意到了我国历史上存在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事实。
- ④ 参见赵双之《先秦时期的民族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溯源》，《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集》第1辑，第207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 ⑤ 参见张亚军《历史上的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3期。
- ⑥ 参见赵双之《先秦时期的民族语言教学——对外汉语教学溯源》，《对外汉语教学论文集》第1辑，第212-21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 ⑦ 程裕楨《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开篇》，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⑧ 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 ⑨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 ⑩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一章“绪言”，第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⑪ 唐兰《中国有六千年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公报〉在香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7年。
- ⑫ 语出《周礼·夏官·职方》。
- ⑬ 《论语·泰伯》，第133页，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
- ⑭ 语出《墨子·公孟》。
- ⑮ 《论语·季氏》，第321页，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
- ⑯ 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4页，三联书店，2000年。
- ⑰ 《论语·八佾》，第38页，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
- ⑱ 参见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5页，三联书店，2000年。
- ⑲ 《论语·述而》，第114页，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
- ⑳ 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转引自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第1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
- ㉑ 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 ㉒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 ㉓ 转引自鲁健骥《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谈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36页，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
- ㉔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余思黎校点，中华书局，1980年。
- ㉕ 参见徐延旭《越南辑略·名宦》，光绪三年（1877年）梧州刊本。
- ㉖ 参见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第12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 ㉗ 参见〔美〕亨特著，冯铁树译《广州“番鬼”录》，第4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 ㉘ 参见〔美〕丁韪良著，沈弘等译《花甲忆记》，第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中国古代の對外漢語教育 ——先秦から明清まで——

王 幼 敏

中国の對外漢語教育は長い歴史を持つものであり、新中国成立後の目新しいものではない。その源は秦の前まで遡ることができ、堯舜の時代に既に外国語教育が存在していたことは明らかな事実である。その頃は漢民族の前身である華夏民族はまだ形成の過程にあり、その他の民族もまだ形をなしておらず、民族と国家の所在は移動・融合・変化を繰り返す状態であった。今日ある統一された中華民族という観点で数千年以前の状況を見てはならない。本文では、その時期に行われていた異なる民族間の言語伝達を一律に外国語教育とみなし、華夏民族と異民族との間で言語の伝達を行うことを對外漢語教育と定義する。最新の考古学資料の分析によれば、上古の夏・商・周の三代王朝は一本に繋がった三つの王朝ではなく、それぞれ源の異なる三種の文化共同体であり、秦の統一後の歴代王朝の継承関係とは大きく異なるものである。「湯武革命」は、それぞれが長い歴史を持つ三種類の文化の継承ではないものの、三種類の文化がそれぞれ補い合い、周時代の学問として全面的に成熟したものであった。

孔子の「教え有りて類なし」の思想は新しい理解をとるべきであろう。「類」とは身分・背景・貧富の差を指すだけでなく、更に重要なのは人種や民族の違いであるとも理解できる。安陽遺跡で出土した人骨は同じ人種の人骨ではなく、専門家の調査によると、孔子の時代の中原地区の人種の違いは依然として大きいもの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わかっている。従って「教え有りて類なし」は主に人種の違いに対してであり、人種差別に反対し、一視同仁の立場をとる孔子の教育平等思想の表れであると言える。

古代の外国語学習と教育は翻訳と密接な関係を持っており、本文はそのいきさつを分析し、上古から明・清までの外国語教育を歴史的出来事を軸としてまとめたものである。